

* 學術會議 *

中國文哲相關系所師生座談會紀要

彙整：鍾彩鈞*

中研院文哲所的設立，是國內外研究中國文哲學者引頸企盼已久的事。因此，本所成立以來即深受各界關切，而寄以深重的期許。緣此，本所亦積極而廣泛地與國內文哲學界接觸，以多方聽取意見，供作現階段工作與未來發展之參考。此次座談會的舉辦，即是一個開端。

座談會係七十九年十月二十七日，於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召開。會議分三場進行，共討論三大議題，分別是：國內文哲研究的現況、國內文哲研究未來的展望以及對本所的期望等。前兩場分中國文學與哲學二組進行，分別由龔鵬程、王邦雄、呂正惠、沈清松四位先生發表論文，作為引言；再由與會師生提出口頭與書面意見，進行座談。

會中出席踴躍，討論熱烈。對於中國文哲研究的現況多所檢討，提出深刻的改進意見；對於未來展望，則揭示出具體的努力方向；而在對本所期望的座談中，則從人才羅致、研究發展、學術交流與圖書設備各方面，提供寶貴意見。本文即係此次座談之紀要，有關第三場對本所期望部分，本期將在「文哲信箱」專欄中作一回應。

* 鍾彩鈞先生，本所副研究員。

第一場 國內文哲相關系所的現況（分組討論）

第一組：中文系所

引言：國內中文系所現況之分析

龔鵬程*

中文系所，在六〇年代的臺灣，曾經被視為頑固保守者的象徵與保壘。在當時，學界瀰漫著「傳統與現代」的意識糾結。中文系不免被看成是傳統的護法。在整個社會努力現代化的洪流中，依然長袍馬褂，維繫著固有文化於不墜；或者，也可說是仍舊食古不化，與世齟齬。中文系所的師生，既感傷於社會淡漠，又必須應付世人疑惑、乃至譏嘲的眼光；但也因此，同時覺得驕傲自負，以道統及文化之傳承者自居，對社會之冷漠，亦報之以「橫眉冷對」，憤世嫉俗。

歷經七〇年「新／舊文學」「中國『文學』系」諸爭論，又跋涉了西方文學批評理論、比較文學對中文系的衝擊之後，輕舟已過萬重山，舊日的陰影雖未褪盡，心頭的烙痕依然分明，但時代畢竟不同了。八〇年代中期以後的中文系所，似乎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民國七十三年，我發表〈中華民國國家文學博士論文內容與方法的評析〉一文時，中文系諸同行頗不以為然，認為評驚不公，論中文系之弊端亦言過其實。而且，我人微言輕，中文系縱使確實存在著一些問題，也非憑我之一言即能改善。

因此，該論文之提出，只顯示了一個意義：中文系所內部仍擁有反省更新的活力。這種力量，逐漸滋長，並配合形勢，遂使得中文系所於各人文學科中，顯得特具生氣。

以中文系所的教學、行政、人事結構來說。中文系本來總予人「老夫子」之

* 龔鵬程先生，時為淡江大學文學院院長，現任大陸工作委員會文教處處長。

感，但它的新陳代謝反而最通暢迅速。像我，才三十四歲，已經做完系主任及所長了。這種現象，只是特例嗎？不！淡江中文系裏比我還年輕的教師幾達二十人。這在從前，乃是不可想像的事。其他學校縱使不至於此，年輕化仍是近幾年可見的大趨勢。此一趨勢，倒也非年輕人硬把老人擠開，奪去了老人手中的棒子；而是在比較溫和圓熟的處理氣氛中，自然達成的轉移。因此，年輕人固然可以出頭，老輩也依然活躍。高明、潘重規、鄭騫、孔德成、史次耘、王靜芝……諸先生，仍意氣風發地在為中研所耕耘，與十數年前亦無甚不同。這是非常特殊的現象，彼此達成了一種微妙的平衡關係。據我所知，史學與哲學界的朋友，對此似乎頗為艷羨。因為在他們的學門中，「論資排輩」的遺習，猶存古風。故對中文系這個以古色古香聞名之系科，竟有如此新貌，尚不甚習慣也。

與此一趨勢相呼應的，是中文系所學術社羣內部的師承血緣關係，已漸打散。現下除了臺大、師大仍維持其系友型態的人事結構外，各校均廣泛聘用不同出身背景的教師。這類現象，若用發展社會學的現代化理論來描述，則中文系所人員結構的變遷，似乎已經從舊有的「血緣」「身分」取向，轉換到「成就取向」；同時，個人在社羣中的流動亦較頻繁。

反映這個新社羣秩序的多元性格，也已逐漸形成。各校中文研究所已能根據其師資狀況及發展目標，來試著規劃課程、制定方向。例如逢甲的「中文計算機系統」，師大的「中韓詩學比較研究」「中韓文化比較研究」「西藏文」，中正的「翻譯與寫作」「近代美學思想」……之類，均可視為該校之特色。雖未必便為他校所無，然總算能照顧到各校自己的需要，應認是可喜的發展。

特別是，中文研究所陣營裏，漸漸出現了一種新型態的研究所。例如清華大學中語系延伸分化出了文學所與語言所；成功大學則結合中文系與歷史系，辦了個歷史語言研究所。這些研究所很難割於中文系所之外，但又與舊有的中文研究所甚為不同。像清華大學文學所，兼治古今中外文學，其課程便與師大國文所迥異，沒有一門是一樣的。它的語言所，大概也只「音韻學」一科，略近於師大國研所系統，餘則盡異。這種現象，自然豐富了中文研究的領域，促進了多元化的發展。而且，假如再借用現代化理論來說明的話，我們也可發現，這是中文系所結構，經由專業化與分化來達成變遷的例子。這種分化，與成大歷史語言研究所之「整合」中文與歷史，取徑似殊，卻有異曲同工之妙。對原有的中文研究所之體質，皆有所刺激。

例如課程的多元化，固然顯示各中文所已逐漸開展了不同的方向，但實際上也

許只是內部權力妥協的結果，或為「因人設課」，與全所方向精神皆不統屬聯貫。因此，師大國文所雖有「西藏文」及中韓文學文化比較的課程，並不能顯示這個所準備致力於漢藏或中韓比較的方向。該所其他各方面課程及研究亦與此無甚關聯。故該課程仍是孤立的。對課程規劃缺乏整體設計與構想，畢竟仍是我們長期存在的問題。現在除了淡江中研所以外，沒有一個所有此規劃及能力。大家要不是不知課程教育規劃為何物、應如何做，就是反對規劃、憚於規劃。

又，如果各所人事結構已有了調整，人員年輕化已成趨勢；那麼，如何整合這批年輕新銳的研究及教學人力，必然成為更迫切的問題。現今四十歲左右已接手擔任中文系所中堅骨幹的階層，在他們嶄露頭角，準備由老輩手中轉換接手的過程中，也許既新且銳。但精神目力，全朝上看，欲由老輩的得失中汲取改變的機會與經驗。現在馬齒漸增、任職漸重，他們的學術規模，已未必新未必銳了；卻發現他們對更年輕的講師、助教、碩士生，反而缺乏了解。和衷一致，共創新局，根本談不上。古典文學會今年初舉辦中文所研究生論文研討會，即是針對這個危機而設。現在中研院文哲所續辦研究生論文發表及師生座談，當然更好。但此必須形成一長期的工作，否則不能奏效。而且，中堅權力階層，應放棄指導者的心態，把研究生當成共同研究的夥伴。新繼的中文所後進，亦不必循推倒權威的方式、或我們過去某些「叛逆」的心態，來彰顯自己。新時代，應有新的做法。

另外，各所多元化的發展，如前所述，有部分係採專業化的辦法。這個辦法，是七〇年代成長的人，針對中文系發展方向常有的思考逕路，也符合結構功能分化的現代化理論原則。但我以為時至九〇年代，此一路向可能應予修改。原因之一，是大學性質整體的變遷，使得大學逐漸從高等教育下降為國民教育。美國的大學生在學人數，高達千分之五一；我國也曾準備在公元二千年時，達到千分之二十三。這種比例，必然使得大學不再是培養秀異分子的地方，大學只提供國民一般教育知識。同理，研究所急速擴張，且做為現今新型態大學的延伸，起碼在碩士班，是不能以培養專業研究人員為目標的。何況，現在中文研究所與社會互動關係如此緊密，反而去培養專業學究式人員，也是逆其勢而行。中文研究所碩士階段的教育，應該是提供社會一批對中國文化有基本了解、且具價值認同感的人。這批人可以迅速進入社會各階層，從事文教及其相關諸事務，以其所學，推動社會文化建設之發展（博士班階段，才來進行專業培養）。這不是專業教育所能辦到的。同時，我更不相信，不懂中國哲學，能談什麼中國文學。割裂分化的專業教育之病，我們已經

看得很多了，在中文教育裏可能更不適合如此。

中文研究所的困難不只於是，以上隨便談談。其他的，我願意在討論時再找機會發揮。

中文所內部之變遷如此，其與外界社會之關係，亦頗有改易。

從前，中文系所被視為一封閉性團體，學者以皓首窮經為職志，任務只在教書。而其研究，大抵也是個人化的，書齋獨坐，丙夜校經而已，待黃絹寫定，便可藏諸名山。漸漸地，出現了一些熱衷於編書、演講、座談、在報上寫文章及不斷發表論述的學者，大家還頗有微辭，背後不免說些風涼話，譏嘲一番。大家對開會討論、羣聚論道，更是不甚熟稔。不是自恃身分、不明規範、視質疑問難為有意找砸，就是嗤之以鼻，謂開會為大拜拜。然後，又漸漸地，中文系所的學術活動頻繁起來了，各種座談、討論、聚會、學術會議，越來越多，且到了幾乎要讓人大喊吃不消的地步。單是淡江中文所，在過去一年中，就舉辦了幾十次小型學術活動，且方式複雜。其餘各校，想必也甚蓬勃。學術的羣體聯繫、合作，較從前改善甚多；學術上的客觀規範也逐漸得以建立。局處於一校一所中，予智自雄，自視為大宗師的時代，不復再矣。

學術社羣內部互動關係增加、活力增強，其對外關係必然擴張。中文系所過去總予人以「鑽故紙堆」的印象，我們也以此自喜。現今則故紙堆仍然在鑽，可是外在世界的變動，我們也一樣關切。學術社羣內部的活動，很多即是與外界合作的結果。中文研究所，與報刊雜誌、廣播電視、各文化團體的聯繫，遠比從前複雜。中文系所也參與了整個社會的文化工作，並成為積極有力的分子。這個特徵，清華、中央、淡江中研所表現得尤為明顯。

諸如此類變遷，大致可以說明前文所謂「新階段」之意。在臺灣現代化過程中，扮演傳統角色的中文系所，似乎也隨著社會的變遷，邁入現代化或已現代化。掙脫舊有的角色限定，展現了它發展更多可能的潛力。在諸人文學科中，它可能轉換適應得比其他學門還要好些。

這個轉變歷程，我適躬逢其盛，且亦為之盡過不少心力。但對目前之現況，卻無滿意之感。因為人力結構改變、社羣內部權力關係重組，只是一個過程；究竟在人力結構調整、課程多元化的同時，當代中文研究的精神方向何在，仍是晦黯不明的。而上文所描述的各項變遷中，不但每項內部都存在著許多問題，各項之間也未必諧洽。

書面意見*（依題綱次序整理）

一、行政方面：如師資、課程及研究環境等

王文進（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中文系所師資學術專長的培養

大學必須兼顧「教學」與「研究」的雙重功能。因此中文系所的課程一方面是用來教學，另一方面應有培養師資學術專長的功能。

在教學上應該放膽實施學生教學評鑑，藉以讓教授隨時得到自己教學方式對學生影響的訊息。

在學術研究上，應該有一種制度可以促使教授就自己所開設課程範圍，在一定年限（三年或兩年）提出研究專著，否則應該將課程輪流開放給其他有潛力的新人登記申請來嘗試。此處所謂「新人」和年紀絕對沒有關係，一個新拿到博士學位的年輕學者，如果他連續數年沒有著作，則他已是學界的「老人」。而一位孜孜不倦的長者當然是學界永久的「新人」，甚或是令人欽敬的國寶重鎮。我想，這也正是剛才龔鵬程先生所講的精神所在。只這有樣，學術的客觀性才能建立，中文學界才能保持源源的活力。

王國良（東吳大學中文系所）

國內各大學中文系所的師資與課程之規劃

1.由北至南，各大學中文系所為了同中求異，務求建立各自的特色與風格，惟宜檢討目前所擁有的師資及設備，重新規劃課程的安排設計。為了形成自己的特色，在教師的延攬方面，可做某些重點的考慮，並打破以校友、系友為導向的用人原則。

2.在研究所的教學上，若一時無法開設的課程，而學生確有需要，不妨開放跨校選課；至少應鼓勵有特殊需求的研究生到校旁聽，並讓他們自由選擇比較適當的指導教授。

* 書面意見中有關各系所現況說明部分從略，俟本所另行全面調查更新資料後，再於《通訊》中一併刊出。

3.在大學部的課程上，除了規劃本系的教學重點之外，在三、四年級不妨開設採訪與編輯、國文教學法等實用科目，也可鼓勵同學修習中文電腦，以利就業之需。

李道顯（臺灣省立臺北師範學院語文教育系）

1.師範學院的師資，在老教授逐年退休，大批延聘國內外高學位教師的政策下，師資水準，較前大為提升。就以省北師院來說，具有博士學位者已超過四十人，佔全體教師人數三分之一強。這些高學位的年輕老師，如能在「專業精神」上多加努力，假以時日，自可成為興國良師。令以擔心的是為數不少的學士助教，他們多半擔任事務工作，沒有教學和研究的機會；年近「不惑」，已失卻了考研究所的勇氣；學校裏「學位掛帥」，升等希望渺茫，這些處境艱鉅的助教，教育當局應該為他們鋪築一條可行之道，不應讓他們自生自滅。

2.師範學院的語文教育系，從名稱來看，不知是語文系呢？還是教育系？或者是教育系中的語文組？就師資來說，都是教中國語文和英國語文的老師；就課程來說，語文只佔全部課程百分之二十點三，教育佔百分之二十九點七，顯然教育的分量較重，但系裏卻沒有學教育的老師。所以形成如此的原因，是因為要目前國民小學的「包班制」，因而師院的畢業生被塑造成樣樣都能而又一無所能的「怪物」了。這都是「包班制」惹的禍，難道「包班制」就不能改為「分科制」或「包班分科制」嗎？

3.師院因為是省市立的，設備經費較國立學校少，因而研究環境也較國立學校差，如果改成國立，情形自然就會改觀。

陳萬益（清華大學文學所）

大學中文系課程設計的問題

1.大學教育的宗旨在「培養國學研究」人才一端，應隨時代演進加以修正而多元化，既可培養研究人才，亦應兼顧配合社會需要的就業取向。

2.教育宗旨稍作修正之後，課程設計才有彈性。例如：文選、詩選及詞曲選的習作固然有其意義；加強白話習作——也就是中文表達能力，以應社會所需的訓練，更為重要。個人認為中文系的看家本領是：閱讀古籍、寫作白話文，這是最基本的要求與課程設計的核心。

陳啓佑（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

甲、關於中文系方面

1.大體而言，除了少數幾所大學中文系外，課程於數十年來變動幅度很小。時代在變，中文系畢業生之出路亦大異於往昔，因而課程之開設宜配合實際需要，勿閉門造車，與社會、生活脫節。

2.即使不配合實際需要，培養寫作能力應是中文系教育目標之一，但是國內中文系在這方面泰半忽略了。於古詩、詞、文及現代詩、文、小說、戲劇寫作的訓練，尚待加強！

3.新文學課程向來在各大學中文系皆是點綴性的，這是一種不知文學流變、貴古賤今的心態。反觀大陸大學的中文系，有「文學專業」（專業即是組的意思），總課程為中國古代、中國現代、外國文學各佔三分之一的比例。

4.除上述應改進部分之外，電腦、外文翻譯人才的培訓，也是不容忽視的。

乙、關於中文研究所方面

1.碩士論文的研究方法方向及論文格式多屬老套，不但落伍，且無優點。

2.各所之論文指導老師均由所方指定，學生很少有選擇的權力。有些指導老師的專長與他所指導的研究生論文內容，完全無關，不知如何指導學生？更有甚者，指導老師學養差，對研究生毫無幫助。

3.研究所之課程，在深度上，是否與中文系不同？依個人所見所聞，一般而言，研究所不過開了幾門與中文系不同的課程而已。

龔顯宗（臺南師範學院語文教育系）

關於師院語文課程合理化的問題

現行師院課程分普通課程、專業課程、專門課程。專業課程即有關教育專業知識的課程，凡44學分，佔總學分數148學分的百分之29.7；普通課程74學分，其中語文學科有22學分，國語1學分（上課時數2）、書法0學分（上課時數1）皆嫌太少；英文8學分，國文6學分，不重視本國語文如是之甚！師院旨在培養小學師資，而小學課程國語時數最多，若師院生國語文程度太差，訓練不足，焉能勝任將來之教學工作！至於語文教育系之專門課程，其學分僅有30，佔總學分數百分之20，除中國文學史、中國思想史外，其他如國學概論、讀書指導、文法學修

辭、兒童文學及習作僅一學期；其中選修課學分數亦均太少。建議在下次修訂師院課程時，專業課程宜減為 20 學分，普通課程中之語文學科增為 30 學分，各系之專門學分，以語文教育系為例，應增至 50 學分，其中有關純文學課程應酌予增加，如此或可挽救師院語文教育之危機，培養學生審美觀念與優美情操。

簡錦松（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中文系所截至目前為止的領導方式，大多數仍然是採用傳統的領導方式，由系所主任主持系所的發展，由上到下地貫徹其一人或少數人的主張。在這種強勢治權的處理方式下，出現了許多見不得人的黑盒子，如師資的聘用、課程、研究資源的分配，都不合理，如此而欲求中文系所能夠蓬勃發展，豈非緣木求魚之事。

所以，希望中文系進步，第一步就是要打破由少數人（或系所主任一二人）掌權的作風。師資的應用，必先經過「著作審查」、「參加學術會議發表論文或討論紀錄的提示」、「學術公開演講」之階段，然後經過「師生投票」，並且特別重視學生反應，如此一來，系所主任的用人權便可開放一大步，連帶地系所事務公開的可行性也就有了眉目。課程安排除可依照上述方法外，應每年或兩年舉辦一次聽證會，帶動全系所公開討論開課得失，逐步使中文系所的意見活潑化、透明化，有改革的契機。

至於研究環境之良窳，不外乎是設備與獎助。各校由於傳統與經費不同，設備並不相同，但由於中文系所自昔日以來牢不可破的自我菲薄觀念，在全校的經費排行上，常常是敬陪末座。以電腦及其他現代化教具而言，中文系的使用應用率極低，壞了也難以維修，成為科技時代中落伍的一羣。這個問題除了各個教師自身應加以檢討外，行政主管部門（系所主任）也應建立正確觀念，向校方積極爭取本身權益，充實設備。獎助部分，中文系所的困擾十分大，以校內獎助而言，中文系所的研究成績常不容易和理工商科系相比，並非中文系所的研究不如人，而是對研究成果的詮釋不同，外科系最常見的論文發表方式，是指導學生，由學生寫成論文，再由教師具名發表，所以他們的「量多」，在校內申請時，常能得到好的評比成績，至於校外國科會獎助，他們也多能用此種方法，接下許多計畫，完成許多論文。我所熟識的人當中，在國際學刊上發表論文的，這種作法，在他們認為理所當然，在中文系所絕對不行。可是中文系卻背負較多的責難，得到較少的研究獎助名額，這是很奇怪的現象。行政主管應該注意這種現象，並想出因應的對策，改善教

師的研究環境。比較可行之道，是協助和鼓勵同仁加強計畫研究的興致與能力，這一點後面要再談到。

林文寶（臺東師範學院語文教育學系）

- 1.希望各校能有自己的特色。
- 2.各校能建立比較客觀且實際的核心課程及其比例。

二、教師方面

簡錦松（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中文系所教師的教學有一個大缺點，就是欠缺明確的教學目標，比如其他科系開設電腦概論課程，它的目標就是要你會簡單的電算操作，認識程式運作，並使學生有進一步研究的能力，中文系則多的是上過就算了。詩選只求欣賞，詞選只講感性，學生上完了，也仍只會說空話。目標在那裏？假使把詩選定位在學生能作簡易的詩篇，知道創作法則，可以檢驗古人作品的優劣，認識歷代詩的發展；由之，學者可以自行寫作，自行討論，自行對外科系人講解，自行選題作深入研究，這樣一來，便具有良好的教學目標了。目標確立的意義，是使教學工作確能給予學者某種學習後的能力，換言之，就是「學得有用」，教師應說明此自覺才對。

現在的學生是聽了外系的課很有用，學了中文系的課程沒有用，所以很多人開始懷疑。我們不能夠再自我安慰，說中文系是修養身心的，你讀了多少書，將來就會有反應出來，一切歸到不可知的將來，有什麼用呢？教導學生，如果你教會他們能寫作詩詞，進而敢去講解詩詞；能夠處理文字訓詁，而後以之用在生活工作上，類此等等之事，乃至所寫的小說散文確實有所進步，可以發表而不臉紅，自然大家覺得學中文有所得了。不然，只是口耳之學，完全無用，難怪學生沒有深厚興趣。

在教材方面，中文系的教師大部分不重視教材的變化，也不重視教具的使用。現在的科技發展，對於教學已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教師如果能妥善利用多種影印、掃描、幻燈，立即投影，傳統投影等方式設計教材、教具，必然會改變教學的趣味，提昇學生的學習效果。不過，為了這一點，我建議應該給予教師製作教材教具的經費補助，而對於學校內教授團中人數最多的副教授，給予半年性的長假，以便

收集、改良教材教具。這一項可以視需要提出申請，依計畫核准，依成果考定成績。

綜合言之，國內中文系所應該加速落實民主領導，重建師資、課程及學生之間的倫理。對於研究的方式、獎助的取得，有更積極的作法，教材設計要以明確的目標作為的準繩，教具並應利用科技器材加以改進，破除「老舊」和「打高空」的作風，是一切教學的總綱。

林文寶（臺東師範學院語文教育系）

鼓勵教師能注意教學理論與教學方法。

第二組：哲學系所

引言：國內哲學系所現況之檢討

王 邦 雄*

一、前 言

國內哲學系所，以量而言，是四班、六所、六系，其中臺大、文化、輔仁、東海等四校是系、所、班一貫，最稱完備，政大系、所兼有，中央有所無系，東吳有系無所。

系所班一貫的四校，在人才培育的功能來說，已可以獨當一面，文化、輔仁源遠流長，東海後起之秀，而臺大是國立大學，得天獨厚，陣容最為堅強。輔仁是士林哲學的重鎮，文化、東海主力在中國哲學，臺大則以英美之分析哲學見長。

政大增所之後，已較有可以伸展的空間，除了著重歐陸哲學之外，並用心於社會科學的整合；東吳致力於與鄉土草根的結合；中央則志在中西哲學的會通，尋求中國傳統與現代化的接合之路。

* 王邦雄先生，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

問題在，系所班的設置、師資名額與學生數量，固然有編制上的大小分異，然而，研究方向與學術成果，卻離不開師資的專業素養。在國內門戶保護的風氣之下，學術交流幾近不可能，而專長重疊轉成不必要的浪費，此為當前國內哲學系所的根本問題。

二、中國哲學研究的現況反省

在中國文化處於弱勢甚至黯淡的今天，國內哲學系所有責任要為中國文化開啓生機。而哲學就是文化的心靈，主導文化的方向，賦予創造的動力。所以，研究中國的哲學，開發傳統的智慧，乃成為各系所共同的責任與課題。

不過，此中大有難處。因為哲學的專業訓練，一定得通過西方哲學的體系架構與思考方法而來，中國哲學的理念，不如西方知識概念的嚴格，甚至也不如佛學名相的豐富。青年學生在學習研究的進程中，逐步的被引入西方概念系統的優越性中，從而獲致理性思辯的高度滿足，並享有為知識而知識的成長樂趣，屬於做一個中國人該當為中國哲學尋求出路的責任感，相對減弱，此所以各系所開出的主要課程，大多偏向西方哲學的原因所在。

其次，當前有志於研究中國哲學的學者，都有一尷尬的處境，那就是很難逃開唐、牟兩位前輩大師一系列專著的全面籠罩，甚至走不進他們詮釋系統的理念架構中，更別說消化了。由是引生一極端的心理抗拒，以反新儒家為獨立思考的表現。此在中堅一代的學人而言，當然也是超越前人追求卓越的志氣，然對新生一代而言，就不免輕忽了做學問的艱苦，此其後果是學術研究各自從頭做起，造成不必要的重複與浪費。

陳榮捷先生有云：「在美國，研究生撰寫博士論文，若不消化熊十力、錢穆、唐君毅、牟宗三諸先生的大作，很難通過。」在臺灣有研究所在課堂上不許討論新儒家的觀點，另有研究所的學位論文，式據新儒家的著作已成忌諱，此一現象實堪玩味深思！蓋其背後，已非學術性的認知問題，而涉及宗教信仰與學派師承的分歧與偏見，故頗難放開與化解。教授學者間隔閡日深，甚至對研究生的論文口試與出路安排，已造成不公平。

其他，諸如以西方哲學的概念與系統，直接剖析甚至套入中國經典的理解與詮釋，不免在概念清暫系統謹嚴之外，少了一點中國特有的精神風貌；而未有西方思

想訓練的學者，似乎很難有突破性與創造性的研究成果，這似乎形成了兩難困境，亟待各系所師生去面對檢討。

三、中國哲學研究的出路反省

國內哲學系所，首要之務在開發中國哲學的智慧。不然的話，當前的社會文化現象，就會出現動力枯竭而方向迷失的困擾，而中國哲學的開發與中國哲學的出路，是不可分的。

從功利主義的價值觀點與實證主義的認知立場來看，哲學是空想而不切實際的。中國哲學的出路，就在能否證明中國哲學的研究可以與現代社會、現代生活直接相干？而其中的關鍵性問題是：哲學的出路在走出純學術的象牙塔，去向十字街頭的衆生說法，也就是要付出社會關懷，承擔時代課題。

若問哲學的生命在那裏，當然在哲學本身。而哲學是宇宙人生的究「極」學問，「極」是生成的動力，也是主宰的方向，宇宙的生成與人生的主宰，就是哲學的光照與熱力。倘若這個光熱發不出來，哲學是沒有出路的，哲學的工作者與研究者，在這個社會上就找不到位置。我們要找到自己的分位，才能開發自己的出路。

當前各系所最大的問題在於我們留不住自己的學生，我們拉引不來第一流的人才，因為我們不能說服自己的學生，不能感動廣大的社會，甚至，我們不能說服自己感動自己。做一個哲學的專業工作者，永遠要問自己，我對當代中國社會能有什麼貢獻？除了守在研究室做純學術的工作之外，我們也得伸出我們的觸角，在愛心與實務的交會中，以智慧的靈光照耀我們立身的大環境，引生互動的成長。不然的話，哲學注定是寂寞而荒涼的。

我願意在此說一句話，新儒家的大師能吸引住那麼多的後起學生，依我的省察，就是他們對苦難的中國說話，對幾千年的傳統負責，而不是派系門戶的權力之爭！

由是而言，我們除了給學生關心時代的責任感之外，還要帶給他們參與社會的切入管道與工作能力，如政經法律、社工環保的基礎知識，甚至，寫作能力也亟待養成。

四、儒學在今天的苦業與原罪

哲學為文化找尋方向，為人生開發動力，假如中國文化還要有自覺的方向，與自發的動力，幾千年的儒學傳統，仍是我們要去傳去弘揚的。

問題是，今天開講儒學，有兩大難題：一是苦業，一是原罪。苦業是儒學承受了歷史的包袱，原罪是儒家本質上的擔當，而苦業正由原罪而來。儒學講內聖外王，外王無疑是中國人的宗教，因為外王是現世的救人，此所以儒家在朝則凸顯擔當精神，在野則表現在批判精神。擔當離不開權勢名利，而有御用文人之譏；批判則形成與執政當局的抗爭，烈士似乎成了無可逃離的命運。

在擔當批判之間，儒學與政治糾結難解，尤其獨尊儒術與失節事大的歷史偏頗，洪憲帝制與張勳復辟的當代牽扯，更成了儒學的苦業。說得確切點，當代中國人根本不相信儒家。獨斷教條與迂腐頑固的形相，一時難以擺脫。

加上儒學在西潮東漸之下，首先意識到文化母體崩解的危機，故用心集中在「體」的維護，至於「用」的落實，卻無力兼顧。這一來更讓儒學與當代有隔，就不免於被中國人流放的命運。

儒學就此掉落在官力假借與民間抗拒的困境中，苦業是拋不開的，原罪總要擔負，儒學要背起「天刑之，安可解」的十字架，奮力開闢儒學在當代的前程，也是中國文化的前景。

我們似乎只有一條路，與官方保持距離，與權勢名利劃清界線，以消除民間之「疑」。再者，在理論哲學的「體」之外，多往實踐哲學的「用」去著力，積極分擔社會責任，以爭取當代之「信」。

中國哲學的研究，離不開中國哲學的出路；而中國哲學的出路，離不開中國哲學對當代社會的關懷與擔當。我們越有關懷越有擔當，就越有出路，我們越有出路，則中國哲學就越發蓬勃。

五、結語

我個人沒有代表性，已不再是鵝湖月刊社的社長，也不再是中央哲研所的所長，我只能代表自己，代表自己的年齡，這一段引言僅志在說出自己的想法，抒發

自己的感受。別人如何，我不得而知。

實則，我已逐步的從哲學所退回到中文系所，我不想學生因我的課而轉讀哲學系，或改考哲研所。因為，我們不能為哲學找出路，卻引導學生走進來，等於害了學生，誤導了學生的前程；另一方面，我卻一步步的從學術研究室走上十字街頭，跟社會人士與青年學生講哲學，化解人生的困惑與痛苦，給予人生的溫暖與支持。我受到的壓力來自學術界的朋友，在理論哲學與實踐哲學之間，要找到一個平衡點，似乎成為我角色認同的重大難題。

最後，引司馬遷的一句名言，來做為我的總結：「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哲學正是究天人之際的學問，它還要「通古今之變」的去承傳幾千年的文化傳統，並落實在今天，「成一家之言」的去跟世界各大文化的哲學智慧，做一交流對話，讓中國文化這一家，永遠通貫幾千年，並在當代世界展現它獨特的風姿。

這不是我們的夢，而是我們的責任。

書面意見（依題綱次序整理）

傅佩榮（臺灣大學哲學系）

哲學系發展至今，學生所學多以西洋哲學為基本要求。如邏輯、知識論、形上學、倫理學及其他分門別類的應用哲學。這對於學生畢業後出國深造固有助益，但卻因而形成中國哲學無法落實研究之憾，如無法釐清中國哲學的特色、方法與表達方式。本國學生多習西洋哲學，而外籍學生則多習中國哲學，長此以往，情形堪憂。因此，應將哲學系分為二系，一為中國哲學系，一為西洋哲學系，如此名正言順，研究人員與學生皆可各安其位，在一可以理解及可能企及的範圍內認真研究，全力以赴，或許可得一些成績。否則一談哲學，中西印都來，卻又泛泛之論，或任意對比，造成混淆，未必有任何學術上的貢獻。

第二場 未來中國文哲研究的展望（分組討論）

第一組：中國文學研究

引言：台灣「中國文哲研究」的檢討與展望

呂 正 惠*

四十年來，臺灣的中國文學研究可以分成三個階段：自足的階段、接受挑戰的階段、以及現在。在第一個階段裏，從大陸來臺的第一代中國文學研究者，把他們的方法（姑不論這是什麼樣的方法）傳授給他們的學生，學生加以接受，根本不會考慮到這方法是否適用、是否夠用的問題。中文系的師生在自己的天地裏作自己的研究工作，沒有對自己的工作方法起任何懷疑之心。但是，到了六、七十年代之交，這種狀況有了突然的改變。外文系的學者，在顏元叔等人的領導之下，開始引用某些西方的方法（特別是新批評的方法）來研究中國文學，對中文系的學者和研究生產生相當大的衝擊。有一些人感到危機的來臨而企圖為「舊方法」辯護，有一些人則求變心切而蠢蠢欲動，經過一段時間的不安，中文系的學者逐漸心情穩定下來，而外交系的學者卻又逐漸從中國文學的領域內撤退。第三個階段從什麼時候開始，恐怕不好明劃界限，不過，它的特色是：中文系學者是在外在（外文系）壓力解除下進入一個混沌的安定之中，真正的危機並沒有解除。在當前的情勢下，由於臺灣意識的高漲影響了許多臺灣知識分子對於中國事物的認同，也由於大陸研究資料比以前百倍以上的容易取得，臺灣的中國文學研究已可以面對更大的挑戰，而進入第四階段之中，只是，大部分的研究者似乎還沒有足夠的自覺。

綜合來看，四十年來臺灣的中國文學研究大概有下列幾點特色，或者不如坦白

* 呂正惠先生，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

說，有下列一些缺憾：

1. 開始的那一階段，研究範圍相當狹隘，有非常明顯的貴古賤今的趨勢，有的大學中文系，甚至還以經學、小學為主體，甚少看到中國文學的研究。在中國文學的範圍內，則研究正統文學（詩、文）的要遠超過小說、戲曲的。研究唐以前的，也要多過研究宋以後的。這種情形，在最近十多年來有明顯的改變，但似乎還未取得完全平衡的狀態。

2. 現代文學幾乎完全排除在課程與研究的範圍之外。由於政治的禁忌，也由於中文系本身貴古賤今的傾向，現代文學極端受到忽視，只是在最近的十年之內，情況才稍有轉變。但一直到现在，考慮到自己前途和學術聲望的研究生和學者，還極少有人願意把自己的命運押在現代文學的範圍內。

3. 剛開始的時候，由於政治因素，四十九年以前的研究著作也差不多完全不能看到，只好憑第一代學者個人的收藏和記憶傳授給學生。這裏學術傳統繼承的困難，無疑嚴重地限制了前二十年的研究工作，為臺灣的中國文學研究立下了一個可能頗有問題的架構。

4. 對於臺灣之外的中國文學研究的狀況與資料非常陌生。同時代的大陸學者的研究成績，由於政治因素而無法接觸，這是不用說了。即使是日本、歐美的，也極少有人留意。學者們真能透過任何一種外語去閱讀外國論著的實在少之又少。

5. 很少學者熟悉外國文學作品，有一些人甚至連讀都沒有讀過。因為眼界只限於中國文學的範圍內，因此不能有更寬廣的文學概念，也不能更清楚的看到中國文學的特質與缺陷。也因此，在初次面對外文系的挑戰時，幾乎有驚慌失措之感。

以上這些因素使得臺灣的中國文學研究彷彿成為學術領域的一座孤島。這種情勢，由於戰後臺灣經濟發展期間過度功利化的傾向而更趨嚴重。其結果就是，臺灣的中國文學研究充滿了一種陳陳相因的「學究氣」，雖然有許許多的「研究」，但「文學」似乎不在其中。

七〇年代初，當中文系學者面對外文系的強烈挑戰時，一些有心「改變現狀」的人以為他們必須重新思考「方法論」問題。至今還有很多人以為，採用一種外來的「新方法」就可以解決困境。其實，問題還應該看得深入一點。所有的成系統的方法都涉及「觀點」問題，都牽涉到複雜的社會與思想因素。不從這裏來掌握方法的「本質」，就不可能適切的應用任何一種方法。舉例來說，傳統方法最重視文學中的「歷史」因素；但是，在臺灣的一些「歷史」研究中，我們就不太容易看到歷

史和「文學」之間的「有機」關係。也就是說，有一些研究者已經陷入「例行」的學究工作之中，不曾重新思考過：「文學」究竟是什麼？「文學」與「歷史」的關係究竟又是什麼？在外文系的挑戰之後，一些比較有心的青年研究者乾脆不去面對「作品」，而只願意去爬梳歷史上的各種文學批評的理論架構，在我看來，就是對於這一個根本問題有意、無意的逃避。

現在臺灣社會日漸開放，大陸研究資料的取得已經不成問題，而且，大陸學界近年來也頗注意歐美、日本研究論著的翻譯，即使不懂外文，我們也能透過這些翻譯大略窺視到外國人研究中國文學的某些方向。在這種情況下，要解決上面所提到的基本困境，我以為下面三點可以說是最重要的：

1.要大幅度的加強中國現代文學的教學與研究。只有從現代文學與古典文學的關係中，我們才能看到文學「傳統」的「活生生」的繼承與發展問題。而這一問題，又由於現代文學明顯的植根於現代的社會現實之中，因此也會逼使研究者不得不反省到文學與當前社會的關係。這並不是說，古典文學的研究者非得「正視」這些問題不可；而是說，由於有傳統繼承與社會現實這兩個壓力存在，學者就不可能使古典文學變成「死物」，而必須思考古代文學與現代生活的關係問題。只要有這樣的壓力存在，古典文學的研究就比較不容易流於學究式的例行工作。

2.應該儘可能的去閱讀一種或多種文化體系下的外國文學作品，即使透過翻譯去閱讀也無妨。現代的中國文學、研究者，如果不能拿外國文學來作為一種「參照體系」，並由此出發來探索中國文學，無論如何也不能免掉別人的批評。譬如說，對於任何一種文類（不論詩、小說、戲劇），只要閱讀過幾種西洋作品，對於我們了解中國文學的特異性就一定會有某種刺激作用。何況，中國現代文學根本就強烈的受到各種外國文學，特別是西方文學的影響，要真正能夠掌握中國文學傳統的巨大變化，當然，非熟悉外國文學不可。說得更徹底一些，自從西方文化強烈衝擊以來，廣義的比較文學研究（不是那種呆板的一對一的比較，或影響關係的研究），正是中國文學工作者責無旁貸的「負擔」。

3.必須從更廣闊的立場來看待文學。文學活動是人的所有活動中的一種，為什麼在政治、經濟活動之外，人還需要有文學活動呢？並不是說一定要研究這個問題，而是說，這個問題必須放在心中。只有在這樣的關懷下，我們才會真正了解到，「文學」為什麼和「歷史」、「社會」有關係，為什麼和心理學、人類學也有關係。透過這些關係，我們也才能了解，文學為什麼構成人類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

環。在這種廣闊的視野下，我們就不能把文學只看作「技巧」問題，只看作意象、聲律問題，或者只看作敘述觀點或人物描寫問題。把文學只看作是技巧問題，是使研究工作流為「例行」的學究工作的根本因素之一。從人的活動的更寬廣的視野來看文學，我們就可以避免掉入這種陷阱之中，而能夠體會到各種理論、各種方法的根本立足點。這樣，「如何研究文學」就不會成為一個極難解決的尷尬問題，不會使我們因為不知道如何解決這一問題而產生逃避心理，或陷入一種無能為力的窘境。

書面意見（依題綱次序整理）

一、歷來中國文哲研究的得失

霍晉明（中央大學中文研究所學生）

1. 現行課程偏重理論研究，多把古典當材料，而對於古典文學本身（詩、詞、曲、賦等），是否當有所繼承與開展？「習作」本身當受到什麼樣程度的重視？即我們對舊文學的生命採取什麼樣的態度？
2. 過去中文之應用與生活密切結合，而今，我們對於生活上的文學需要，如，壽序、賀詞、對聯、書信、墓誌等，是否仍採取老的那一套？若不適合，則當如何發展當代的應用文？如何使「中文」在生活上發揮實際的文化教養之功？

二、中國文哲研究可發展的方向

陳萬益（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請配合時代趨勢促進現代文學的研究

1. 上一年度成大史語所、東吳中文系有四、五篇現代文學的碩士論文提出，顯然這是一個時代潮流。
2. 在現代文學研究風氣已開情勢下，我們應想辦法建立資料，增進討論風氣以培養較具學術規範的論文。
3. 我們的研究所博士班應可考慮招收現代文學的研究生，以鼓舞現代文學的研究。

陳啓佑（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

1. 學術研究可分兩條路線進行，一是深度化，另一路線不妨通俗化。通俗化並非低俗、粗俗化，唯有深入淺出的通俗化，研究成果讓大家分享，才能提升大眾的文學水準。

2. 長期從事「集體研究」的工作，如日本、大陸所做的。集一些人的知識與力量，可以有更佳、更大的果實。

鮑國順（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一、加強文學的研究：

對當代文學的資料及其作品，詳加收集、整理與研究。

二、加強國內各系所的師資交流。

簡錦松（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集體研究，分工入微」是未來中國研究的必然方向。最先通過大陸研究成果向臺灣湧進的河流，我們清楚地看到：大陸上個人的研究成績是不及臺灣許多個人的，但是他們有一套一套的著作，涵括了各個角落和層面，或是對某個朝代、地區的整理、古書的標點，我們並沒有，於是，有各種自悲自憐的說法出現。其實以大陸的交通不便，研究資料不流通，得書不易，出版不易，大圖書館管理方式落伍等條件與臺灣相比，臺灣應有更好的發展才是，可是，臺灣的學者並不習慣於分工合作，所以失敗的可能性便很大。

將來，是否可以請研究範圍相近的人，聯合申請國科會經費，再就同一大題下，分工合作，務求精密，形成一個研究網路，共同提出研究成果，主管計畫審核的部門，如國科會或各校校內助審委會，以集體研究作為優先考慮，帶動風氣。

（為了考慮到國內中文學者不合作的事實，也可以由教授到教授帶領研究生，申請集體研究計畫。）這樣的建議，在理工商醫各科系並無新義，因為他們已經透過國科會的「計畫獎助」項目，早已在這樣做了，而中文系目前是很缺乏的。

如果不做集體研究，可以預見的，要做好對一個時代的「全面了解」必不可，而學者浪費在彼此互相批評和交際的時間太多，要利用同儕成果而深入到某一要點作精微解析的話，也十分困難。現在臺灣所保有的研究優勢：第一有方便的圖

書設備。二、有較多的科技輔助條件。三、碩、博士學位的發展正常且蓬勃。四、社會財富有向中國文學回流的現象。五、可以自由採購大陸資料，而大陸反而不能得到臺灣或其本土書籍。挾著以上五個優勢，如果能形成幾個研究集團，從：

- 1.徹底了解同部門海內外研究成果。
- 2.徹底收集本研究範圍內書籍。
- 3.分工合作，就全盤研究需要加以分配。
- 4.認真治學，把分配範圍處理好。
- 5.政府或財團予以合理輔助。
- 6.成果具體出版、翻譯介紹。

這六點逐一實施，必然會有良好成績展現在國際舞臺上。反之，臺灣的學術界必然會被大陸洪流所淹沒。

補充說明

1.研究眼光的開拓，並不是多看西洋文學，來反省中國文學；這完全是兩回事，必須由更廣闊的中國了解，包括廣泛的文學作品研讀「定點定時之歷史地理研究」「物質文明發達歷史之研究」，這樣的了解，才可以還原出當代作品的特色，達成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基礎。

2.「大陸上的分類方式，現在已經出現問題，對古典文學的不了解，到了令人驚異的地步，何以大家都不說」——針對呂正惠意見反駁。

- 3.從大的角度立場來看文學是正確的。
- 4.設立南部研究中心。

5.我固然贊成加強新文學教學，但是要知道研究上，新文學研究和古典文學研究是不同領域，現在大家一直說加強新文學研究與教學，雖不能說不好，但是，中文系教師——如果是研究主題在古典——仍應再檢討古典文學研究的缺失。

- 6.兼顧古今、分別研究。

三、如何促進國內外文哲研究的交流

陳啓佑（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

- 1.成立漢學資料中心。
- 2.培養各種語文翻譯人才，迅速提供全球中國文學研究成果給國內學界。進

而，能與國外研究漢學者做學術交流。（關於培養語文翻譯人才，或許可和外文系所合作。）

謝一民（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

可由文哲研究所每年舉辦各類學術研討會藉收學術交流之效。

第二組：中國哲學研究

引言：未來中國哲學研究的展望

沈清松*

一、前　　言

要確立中國哲學未來的發展，必須要立基於過去的研究成果之上，以下謹根據我對中國的哲學史發展的了解，首先將當前的研究階段加以定性和定位；其次檢討當前此一研究階段已有的重要研究成果，在檢討之中，從繼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優良成分、補其缺遺的角度，來展望未來的研究方向。

首先，按照我的了解，迄今以來的中國哲學史，基本上可以分為四個重要的時期：

第一個：是從《尚書》與《易經》開始的中國哲學傳統，發展到先秦諸子，形成鼎盛之時期。其間，尤其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諸家哲學，構成了此一開創時期的豐富內容。

第二個時期：自隋唐以後，由於佛學的傳入，次第發展，中國哲學界致力於發揮原有思路與語言特色，融合佛學，因而逐漸產生各宗的中國大乘佛學，例如：三論、唯識、華嚴、天臺諸宗。

第三個時期：至宋明以後，理學家們在為學艱難的自覺之下，以儒學為本，融

* 沈清松先生，政治大學哲學研究所所長。

合釋道，形成宋明新儒家哲學。

以上可謂中國哲學史上公認最有成就的三個階段。

第四個階段，自一五八三年天主教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來到中國，帶來了西方之科學、哲學與宗教以來，中國哲學界便踏入了第四階段，以融合中西為其主調。此種融合中西的工作，從利瑪竇、徐光啓、馮應京、李之藻等人之刊譯西書、引介西學，並以士林哲學融合中國哲學，形成首次融合中西的嘗試。其後，清初學者顧亭林、閻若璩及乾嘉學派，更採用利瑪竇、傅汎際所引進的數學和邏輯，用歸納和分類的方法，考訂古音古書，開實證研究之風，是第二種融合中西的嘗試。其後中國哲學界不斷譯介西方哲學迄今，但一直未能產生融合中西的哲學體系。直到一九四九年以後，才逐漸形成以下四種融合的研究成果，換言之，基本上我們所立基其上的當代中國哲學，主要的成就都是某種方式和某種程度的中西融合體系，顯示融合中西哲學已然為當代中國哲學的主調。

二、幾個融合中西的哲學範例

第一個中西融合的範例是方東美的哲學，代表了一種兼融並蓄的融合導向。其哲學是以美感經驗為起點，並以之為融合中西的主要線索。一部二十二子，方東美只圈點莊子〈知北遊〉「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一語，可見美感經驗是其主要格調，尤其方氏文字之美，典雅芳菲，足以凝聚思想，切中事理。

方先生在融合對象方面，西方不計其為上古、中古、近代或當代，中國不計其為歷代佛家、道家或儒家，甚至印度哲學的精義，只要能發揮形上學的深意，闡揚人性論的闕旨，皆取來予以綜合。

就形上學而言，方東美肯定存在的多重性，指出存在界由物理、生物、心理（以上屬自然界），逐層上升至美感、道德、宗教（以上屬超越界），並認為下層可向上層演進，逐層提昇，稱之為「上迴向」，而上層亦可向下層穿透，貫注力量，拯救現象，稱之為「下迴向」。

就人性論而言，方東美主張人性的可完美性，認為人可由「工匠人」到「創作人」到「知識人」（以上為自然人），晉升到「象徵人」到「道德人」到「宗教人」（以上為超自然人）。人性可由下往上發展，是謂上迴向；亦可由上往下，貫注上層的力量，是為下迴向。

其次，人性和存在的各層級，相互蟬連呼應，形成諸種差別世界，而諸差別境界可以秉持動力，次第發展，逐漸提昇至不可思議境界，差別境界與不可思議境界彼此互動。而不可思議境界又為一切創造力之泉源，可循下迴向逐一貫注於存在與人性之各層次，而各差別境界後可持之以為動力，向上發展，形成一個不斷發展、循環有機的宇宙觀。

第二個融合範例，唐君毅先生的哲學，是以道德經驗為其出發點。他所傾向的綜合，在使西方的唯心論傳統和中國陸、王的新儒學傳統相結合。唐君毅新儒家的融合導向，以道德經驗為緣起，以立人極為依歸，以勾勒主體性之動力與結構來成立科學、人文、宗教之超越依據為其主題。

就形上學而言，唐氏以為所謂的「存在」，是指「有生命的存在」；就知識論而言，他認為境乃心所感通，心境相互為用，由於心境互用而產生心靈九境，此即所謂主體性的動力與結構。此心靈九境中的前三境，主要在確立「個體」、「概念」、「原理」的地位與內容，藉以說明客觀世界的構成，並奠立科學的超越依據。中三境則探討人的「知覺」、「語言」、「道德」的形成與發展，藉以說明意義世間的構成，奠立人文的超越依據。最後三境為立人極的最後實現，分別探討神、法和盡性立命，分別了「一神境」、「佛教境」與「儒教境」，最後以儒家統攝佛家與耶教，在哲學上成立了儒家的宗教性。

第三個中西融合的範例是牟宗三先生的哲學，主要以知識批判為起點，其早期的作品無論是《邏輯典範》，及其後的《認識心之批判》，主旨旨在模擬康德批判的工作，使邏輯和數學獲得先驗的依據，而不致落入實證主義的窠臼。就此而言，牟先生的哲學特別顯示出過去實證主義從萌芽到發展。對陸、班空疏之學的反動的一種再反動，從實證主義轉向先驗哲學。

然而，牟先生的哲學並不停留於康德的形式性批判，卻特別要指出「智的直覺」的必要，認為儒家的性理、性智，道家的玄理、玄智，佛家的空理、空智，皆屬智的直覺，而非如康德的形式條件。並從先驗的哲學轉出無執的存有論，提出自由無限心，為存在界最後的本體依據。然後再經過他對大乘起信論一心開三門的詮釋，提出了良知的自我坎陷之說，意圖依自由無限心分別開出民主與科學，作為現代化的根本動力。就此而言，牟先生的哲學可謂對中國人自五四以來的國家目標——民主與科學，奠定了先驗論和本體論的哲學依據。

第四個中西融合的範例是羅光的哲學，主要是從宗教的信仰為出發點，而其哲

學工作主要是透過亞里斯多德與多瑪斯的士林哲學，來結合中國先秦哲學的融合工作，因而不同於唐、牟以德國觀念論融合陸、王哲學的融合工作。

羅光曾系統介紹士林哲學，著有《士林哲學》二巨冊，亦曾系統的整理中國哲學，著有《中國哲學史》九冊。其主要的融合論點是以士林哲學的存有論，來結合中國哲學的變異觀，達到即存有即變異的論點，認為太極是一切變異的存有學基礎，太極依陰陽產生變異，創生萬物，一方面變異中有生發的歷程，稱之為道；另一方面，變異中有結構的原理，稱之為性，羅光認為太極即為創生的原理，可比擬於其信仰中所謂有位格的天主。由於即存有即變異的道理，更由生生不已的形上學引申出一套生生不已的宇宙論。至於人性論與倫理學則是立基於形上學和宇宙論之上，人性可以不斷發展、擴充自我，由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到形成大同世界，到達致萬物一體，甚至最後天人合一，羅光認為人性的實現必須經由這四階段。但他認為人雖可與天合一，但人不就是天，因此他主張人還必須空虛自己、觀己之過、空虛自我意識，然後才能達到與天、與萬物的圓融。

在以上四個當代融合中西的哲學體系中，融合者皆各有其深厚的文化經驗作為依據。方東美從美感經驗出發，唐君毅從道德關懷出發，牟宗三從知識批判出發，羅光從宗教信仰出發，皆可謂各有所本。他們所融合的，除了方東美先生兼容並蓄的態度之外，似乎也各有偏好：唐君毅於西方，特取其唯心論體系；牟宗三於西方，特取康德的批判哲學，兩人在中國哲學方面皆特別重視宋明哲學，尤其其中的陸、王一系。羅光於西方哲學，重視希臘、中世，於中國哲學則特愛先秦。

三、從評估中展望未來研究方向

前面四個綜合成果，主要皆表現在中國哲學史的整理與詮釋方面。然而就立基於前人肩膀上來展望未來而言，今後的研究發展，仍然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在中國哲學史方面，除了前述數位當代哲學家能貫穿歷代中國哲學史之外，目前在年輕一輩的研究者，由於現代研究的分工，以及師資培養上的缺陷，皆只能精通某一時期、某一學派、某一家，而且研究有過度集中的傾向，如集中於先秦、宋明或孔孟、老莊、朱陸等這些大的時期、大的學派或大的哲學家，一方面很難形成通盤的了解，另一方面亦往往形成斷層的現象，有些時期，有些較小的哲學家、有些學派，迄今尚未有夠分量的研究成果出現。就中國哲學史而言，貫通性的

了解是一個研究者所應具備的基礎，就此而言，目前的研究者往往不如前輩。而就研究的涵蓋面而言，今後各大學、研究機構的哲學教育與哲學研究工作，應該儘量涵蓋各時期、各學派、各哲學家，使新的研究方法延伸到中國哲學的各個領域，避免斷層現象的產生。

第二、若要從事中西的融合，對於西洋哲學當然要有深入的了解，比起中國哲學史來，迄今西洋哲學史的研究成果可謂相當薄弱。前述數位綜合範例，除了對自己所喜愛的哲學時期或學派有所譯介之外，並未有通史性質的西洋哲學史的著作。方東美先生雖然於西洋哲學採兼容並蓄的態度，卻除了曾譯介實用主義，論述〈黑格爾哲學之當前難題與歷史背景〉之外，未曾有西洋哲學史的著作；羅光僅介紹過士林哲學；牟宗三譯介康德哲學與維根斯坦；唐君毅著哲學概論，但對西方哲學的問題與發展並未作過系統的整理。至於新的一輩，在目前的哲學教育和研究的情況下，亦較傾向於某些大的學派和哲學家，其對新的思潮的認識誠然較前輩為多，但對於西方哲學通史性的貫穿，仍然一如前輩一般，往往偏好於某個時期、某個大的學派，或某個大的哲學家，因而一方面缺乏貫通性的了解，另一方面亦形成了斷層的現象。就此而言，對西洋哲學史整體性、系統性、貫通性的認識，以及對一時期、某一專家的研究，應能夠以系統方式進行、彌補斷層，使各時期、各學派、各代表人物皆能推得出適當的研究人才與研究成果，如此才能真正有助於中西哲學的融合工作。

第三、各哲學學科及其問題體系性的探究：中西融合不能只表現於中西哲學史的整理與詮釋，此外，必須表現為各個重要哲學學科體系性的問題、學說、方法的探討與評估。然而，上述幾位重要的融合工作者，他們鮮少對於形上學、知識論、哲學人學、倫理學、宇宙論、自然哲學、社會哲學、宗教哲學……等系統性的哲學科目，整理各學科的方法、問題與學說，逐一加以評估，藉以展現該學科現有的研究成果，此仍有待今後研究者的參與和投入。

第四、一個學科的發展，除需要有由中國人自撰的教科書，還需要完備的工具書，將該學科有關的術語、人名、學派、學說作適當的翻譯與界定，否則學者立場不同，各執一詞，不容易形成真正的進步。其次，中西哲學本身的融合工作，必須建立在對西方原典的認識與消化上，因而對於西方重要經典有系統的翻譯，是真正扎實的重要工作。關於這一方面，迄今的四個綜合方向，在人名、術名、譯名的標準化方面貢獻很少，而這工作本身也可以成為一研究的方向。至於翻譯的工作，其

中像牟宗三、方東美、唐君毅都各自作過一部分的翻譯工作，但迄今中國哲學界在有系統的從希臘、中世紀、近代乃至當代每一時期的重要學派、重要哲學家經典之作上面，皆譯果空疏，大有後人貢獻心力的餘地。

最後，中西哲學的融合工作，主要應確立一種「主體——資源」的文化觀以代替過去「體用」的文化觀——無論是「中體西用」或「西體中用」，或是「中西互為體用」。自今而後我們必須覺醒，當代中國的哲學研究者本身為一文化創造的主體，但此一創造的主體，必須運用其已有的資源，例如：傳統的中國哲學、西洋哲學，或世界任何善知良思。因此，無論是存在於中國經典中的思想、生活與情懷，或是存在於西洋哲學中的方法、觀念與體系，都必須透過主體本身的消化，才能成為新的創造的依據。就此而言，體用的模式已顯得過於空疏，無法面對當前的問題，只有透過「主體——資源」的關係，來重新定位綜合者和所綜合的內容，才可謂不失本意。

四、對應生活世界的哲學綜合

然而，所謂中西的綜合不只是一種文字的綜合、概念的綜合，因為哲學家所面對的是不斷變異中的當代世界，在這個變遷的世界當中，包含我們生活周遭的臺灣本身在現代化歷程當中，亦隱藏了深層的哲學意義。而整個中國，在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衝擊之下，正經歷了文化的異化和社會的異化，亦需要從哲學上加以爬梳整理，分析批判。最後，整個世界也面臨了歷史的轉捩點，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皆已無法再提供組織個人和社會生活的原理，人類必須尋求新的出路；整個現代世界和現代性也已遭到了質疑，因此而有後現代思潮的興起，在現代與後現代之間中國人將何去何從，也需要加以定位。

作一個中國哲學研究者，當然也不能自外於這個普世性的歷程，故所謂中國哲學的研究，不能自限於傳統中國哲學題材的詮釋。當代的中國哲學研究者，必須以主體對待資源的態度，來思考傳統哲學題材、一般的哲學問題，甚至環繞著他的生活世界，由臺灣、到中國、到世界的基本問題。因此所謂中國哲學，應該是指著我們當代的中國人對這些傳統題材、一般哲學問題，以及周遭世界所作的基礎性的、整體性的和批判性的思考與研究，而不必狹隘的限中國哲學於某一種色調之中。雖然研究必須專精，但整個哲學界研究的涵蓋面應求其完備，不致形成斷層的現象。

尤其在上述提出的問題中，最重要的是中國現代化所含蘊的哲學問題，因為無論臺灣或是大陸，目前皆在現代化的過程當中，雖然臺灣在現代化的路途上走得較遠，大陸則是剛起步不久，但整個中國繼續走向現代化是毋庸置疑的，恐怕也只有在相當程度的現代化之後，中國才可能走向統一。

然而中國人所要走的現代化，顯然的並不是目前已在西方產生弊端的現代化，而是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究竟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應該如何尋找，當然不是中共所謂的顧及國情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是應該立足於中國的哲學和文化的動力。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如何從哲學的角度接引現代化與中華文化，勢必成為今後哲學研究者重要的研究方向。在這個過程當中，社會科學界、人文科學界都可以對現代化提出他們的貢獻，然而，如何接引現代化與中華文化，則非要有哲學的反省無以為功。目前的社會科學界多以引進西方的方法和學說為能事，至多以臺灣或地區性的經驗和實證的研究，作為方法的應用和檢證的依據。因此所謂「中國的社會科學」，仍然是一個十分表面的說法，如果要真正形成「中國特色」，最後終需在哲學上加以確定。因此如何思考現代化所隱含的哲學向度，如何去賦予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以基礎，並透過此種奠立基礎的工作來介入現代化的過程，來接引現代化與中華文化，可以說是在今後融合中西問題上面一個最具體的研究方向。有別於先前中西哲學體系的融合工作。這一融合工作必須動用中國、西洋，尤其是當代的哲學理論和概念的資源，來解析整個現代化歷程中所遭遇到的問題，在扣緊問題、思考問題上形成真正的融合。

誠然，西方思想的繼續引進是此一融合工作中十分必要的條件，當代各種思潮層出不窮，往往令新的研究者目不暇給，甚至追逐思潮、喪失定見，然而忠實的引進與了解，仍然是恰當的批判與消化的依據。所以現象學、結構主義、批判理論、詮釋學、解構論、分析哲學等等當代西方思潮的繼續研究，仍將提供未來綜合以重要的資源。

然而既然身為中國的哲學研究者，在研究的方向上，自然不只是追逐西洋研究者的後塵，而必須逐漸加以消化，預備綜合的條件。而這種綜合潛能的發揮，主要必須將這些引進的西方思潮、其問題與方法經過下列程序的反省：

其一、這些西方思潮與現代中國的經驗的相關性，以及中國人個人和社會在當前發展歷程中所遭遇的問題的相關性。

其二、這些思潮與中國人所一向關心的人性、價值、文化、安身立命……這些

實踐取向的相關性。

其三、這些思潮、問題與方法與中國傳統哲學中相應的觀念、問題與方法的相關性，透過比較研究，發掘彼此的勝義。

總之，當前以及未來中國哲學的研究，依然是要以融合中西作為主要任務。唯有立足於前人已經作過的成果上，補其缺漏，對於中國哲學和西洋哲學進行更為無私的篩選與比較工作，發掘其中永恆哲學的問題，並且勇於面對自己所處的生活世界、面對中國人和世界人類的未來，為人文社會現象提供哲學的分析架構。在面對生活世界的建構之中，提出中西哲學的融合。換言之，不再只是面對觀念系統的融合，而是以中國人作為主體，運用中西的觀念系統作為資源，面對當前的生活世界進行綜合。也許每人所能作的，皆只是局部的綜合，但是整個生活世界的變遷與形塑，自然會顯示出整體綜合的效果。

書面意見（依題綱次序整理）

一、歷來中國文哲研究的得失

孫振青（東吳大學哲學系）

在過去數十年以來，一直到今天，中國哲學的研究似有偏差。有些人似乎認為，所謂中國哲學就是儒家之學，所謂儒家之學就是新儒學就是某學派之學等等。這個主張一方面忽視了中國哲學之全貌，一方面走向了極端的主觀論，違反了孔夫子的中道精神。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這個「鮮」字用在今天特別恰當，因為許多人與中道精神背道而馳，因而與儒家也背道而馳，且不自覺，希望國人在這方面有所覺醒。

二、中國文哲研究可發展的方向

孫振青（東吳大學哲學系）

1.過去的研究似有偏差：走向了主觀論，而忽視了客觀面，我們必須掌握客觀真理。總之，我們的方向是主觀客觀兼顧。

2.研究中國哲學者需要真正了解西方哲學，唯有如此方能追求中西哲學之會通

以及哲學與現代生活之融合。

3. 沈清松教授所提兩點極有價值：一為中西哲學之會通，一為哲學與其他科學之整合，這也是東吳哲學系要走的路線。

三、如何促進國內外文哲研究的交流

張振東（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

各大學皆有其特色，各校皆有特別專長的教授。因此，可以准許研究所學生選其他學校研究所老師的科目，並承認其選修的學分，使國內的哲學可以交流。

第三場 對本所的期望（綜合討論）

一、研究人才的延攬

李惠綿（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學生）

請考慮延攬外語人才，如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等，長期做西方文學、哲學經典或研究理論的翻譯工作，加以出版，提供文學、哲學研究之參考。同時可以透過翻譯，將國內研究成果介紹給國外的學者。

古國順（臺北市立師範學院語文教育系）

- 1.建立人才資料庫，包括海內外學者及研究生，觀察其研究發展潛力，主動延攬。
- 2.如經費許可，可否在編制研究員之外，延聘短期研究員，其時間長短，視貴所需要而定。

鮑國順（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開放人才的延攬，兼容並蓄以培養旺盛的活力。

簡錦松（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 1.破除一切成見（並不是說現在已有成見），永遠維持民主作風與活力，取用有活力、敢做事的人才；所用人才，應具有對事負責而不戀眷職位的負責態度。
- 2.先建全內部，徐圖對外發展。
- 3.多用借調的臨時人員，代鋪貴所基礎，使基礎廣而且深，且易見成績。
- 4.「嚴」以待專職人員，以養成不苟之才；「寬」以待借調人員，以發揮不羈之才。

二、學術交流的推展

曾漢塘（臺灣大學哲學系）

1. 請貴所每年、每半年或甚至以季刊方式出版學術刊物二種，一種收列中國文學的論著，一種則收列中國哲學的論著，並開放由國內、外學府師生及相關研究者自由投稿，嚴格審查，擇優刊登。期能建立國內此方面的權威刊物。

2. 請貴所每年至少舉辦一次學術研討會，文、哲分開舉辦。先確立主題，廣泛徵稿，審查後邀請發表，除促進交流，亦提昇研究風氣。

林啓屏（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學生）

建議結合人力資源，從事集體研究，以期對學生能起帶領作用，並促進學者間的交流。

曾慶豹（政治大學哲學研究所學生）

期待於文哲所者有三：

1. 出版「中國哲學年鑑」

涵蓋性的簡介一年來中國（臺灣）哲學界在學術上的成果，包括學術人員、著作、活動、研討會等；一種綜合性之通訊，以茲交流。

2. 出版「中西哲學研究學術目錄索引」

編製「索引」，對學術工作者將有莫大的幫助，是作為推動學術發展的基本工作。

所謂「中國哲學」，應指在「中國」（臺灣）地區的「哲學」研究，而不限於「中國哲學」的研究。

3. 拓寬發表研究成果之園地

請提供專供研究生發表論文之園地，以提昇研究生學術研究素質。一來不讓教授級作品壟斷；一來也可以刺激研究生的研究風氣。

張振東（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

1. 就哲學言，請每一學期舉辦一次全國性哲學研討會，邀請臺灣各大學哲學系

所授課老師與研究生參加，以促進學術交流。此外，並舉辦國際性的哲學研討會，俾與國際哲學界交流。

2.運用補助經費，邀請外國哲學界有成就之中外教授來所訪問或研究，以促進國內外哲學之交流。

黎建球（輔仁大學哲學系）

1.在研究生研究成果交流方面，目前所舉辦「研究生論文發表會」的方式甚佳，可繼續實施。

2.可就中國哲學、西洋哲學及中西哲學融合三方面分別舉行成果研討，以達成學術交流目的。

古國順（臺北市立師範學院語文教育系）

1.除主動了解國內外學者及研究動向，進而促使其互相交流外，同時也推動國內各大學及研究機構間的交流。

2.出版專刊，介紹各學術機構及學者正在進行之研究主題及研究方法。

3.刊布貴所或其他研究機構及個人之大型研究計畫，徵求合作人才。

胡楚生（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

國內中文系課程中，一般也開設不少中國哲學方面的課程。個人感到，中文系對於中國哲學的了解，最欠缺的是思想架構、思想方法方面的知識。這一方面，哲學系應能提供相當的幫助；反之，在中國哲學原典意義的掌握方面，中文系疏證的工作，也可以提供哲學研究者某些參考。因此，將來中研院的文哲所無論在形式上是否分峙，但在實質上，希望儘量多作相輔相成的工作，從而獲得更好的研究成果。

戴瑞坤（逢甲大學中文研究所）

建議以集體研究方式，進行各項相關的文哲研究，以日本漢學（文學、哲學、史學、藝術……等）的研究機構中心為例，如東洋文庫、東洋文化研究所、東京大學中哲所、中文所、漢學中心、亞細亞資料中心、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中心……等，每月或每週皆有固定例會，依類別集合各界提供心力作集體與分工的研究（如

敦煌研究小組、明史研究小組、宋明理學研究小組……）。文哲所未來亦可為學界作此統合協調的聯繫工作。

鮑國順（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請建立中國文哲研究學者檔案，以提供各學術單位參考。

簡錦松（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1.建議多舉辦學術會議，多編印學術刊物。並居於領導地位，協助、配合有關民間活動。

具體作法包括：

①調查臺灣及中國大陸、美日歐等地中國文學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作成電腦連線資訊，並印成專書，對外發售，以供參考。

②協調國科會獎助「集體研究計畫」，乃至其他一切有助於推展中國文學研究的活動或會議。

③與財團或民間團體保持良好關係，以爭取經費補助。

2.緩談國際交流。

3.與各校合作研究計畫，以面的發展來擴大貴所的接觸範圍；換言之，各大學之研究發展方向，可以由文哲所協助。

4.在兩岸學術發展上，知大陸而知自我，不必作意氣之爭。

三、其　他

林啓屏（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學生）

建議將六經或子書輸入電腦，以利研究工作。

李明輝（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

建議文哲所在未來的計畫中推展西洋哲學名著之翻譯及哲學教科書之編纂。哲學教科書宜採選文方式，就各類子題撰寫或翻譯若干論文，此計畫可與大學哲學系所合作進行。

王國良（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

1. 請文哲所出面，邀集國內各大學及研究單位各文史哲學專家代表同聚一堂，討論中文論文寫作適當格式，經過試用修正之後，刊行中文論文寫作標準格式，讓全國文史哲學師生有恰當而便利的規則可循，免除目前凌亂不一，各自為政的弊病。
2. 文哲所日後出版研究書刊及期刊，可訂出標準編排方式，或在稿約中聲明可接受的格式，藉以帶動國內中文論文寫作之標準化、規格化。

張振東（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

收集國內各大學哲研所出版的論文與哲學刊物，以及大陸出版的哲學刊物與典籍。

黎建球（輔仁大學哲學系）

1. 期望文哲所能建立成為亞洲甚至世界的文哲圖書中心，以利研究者研究。
2. 成立專題研究室或中心，先可就中、西哲學中之重要主題成立一、二個研究室，促成集體研究，學術整合的目的，也可以和大學系所的研究中心聯繫。
3. 出版文哲所研究月刊、季刊或半年刊及通訊。
4. 對於文哲綜合或融合的可能，能多作研究或探討，以結合文學與哲學的發展。
5. 文哲所不必文哲分組，而是以研究專題或研究中心分類，如此則文哲所整合性之功效可能更大。

謝一民（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

欣見中國文哲研究所成立，吳宏一教授品德學術，著稱於士林，必能發揚文哲學術，與理工競相輝映。

丁履謨（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

1. 請具體支援中南部學術研究：
 - ① 學術研究：主動聯絡、介紹貴所及中研院可提供研究之資料、圖書。

②短期研究之食宿支援，個人付費亦可。

2.利用寒暑假舉辦學術研究會：

可分論文發表、專家引言、講評與討論等方式進行。至於經費方面，不妨採自費參加方式，以示誠意。

林文寶（臺東師院語文教育系）

希望能透過貴籌備處，擬訂出適合國情，且不悖傳統的文科論文寫作基本格式。